

不只關心 更要反思 作家以文字為社會發聲

副刊專題一連三期的「華文創作生態面面觀」系列，通過與今年書展蒞臨香港的六位作家對談，去發現華文創作生態的最鮮活面貌。

做一位公眾意見領袖就意味着承擔更多社會責任，言論不是為了取悅人，而是為了警醒人，這便要經受種種壓力與質疑之聲，特別是將這言論化為文字、落實於寫作，白紙黑字留下供後人考據對證的文字時，便更需要精準理性的思維以支撐自身獨特觀點。李承鵬和加藤嘉一，是兩位身份背景截然不同卻又有着千絲萬縷相同的評論者，前者是資深球評人出身，後者以學生身份在SARS疫情高峰時從日本來到北京大學入讀，但他們的共同點，是都有過媒體從業經驗，有着媒體人對社會格局獨有的敏感度。而身為寫作者，他們亦同樣關注中國社會，並有勇氣承擔。無論讀李承鵬的《李可樂抗拆記》，或加藤的《中國，我誤解你了嗎》，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風格中，我們都能看到他們對社會的反思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（部分）：彭子文



把中國當作一輩子的事業 加藤嘉一

李承鵬 以評論走在人間路上

如果用一句話去白描這位27歲的日本年輕人，應是既聰明又坦誠。他的中文造詣自不必說，慷慨陳辭著書立說已不在話下，最難能可貴的則是他對中國社會的真正投入與理解。說他聰明，是因為他對中國的人、事、現狀之敏銳，不輸本土的專業學者，說他坦誠，又因為他直言不諱自己的自信，正如他費時3年，以日文完成的新作之書名：《我要成為日本海的橋樑》。

身為日本人，觀察中國其實已有一定根基，日本文化中的中國影子無處不在，上至儒家思想，下至三國赤壁。對於中國的古代思想與歷史，日本有根深蒂固的興趣熏陶。但對加藤而言，中國不只是他的情結，更是一種越了解反而越覺神秘的文明。他說：「中國的很多邏輯你說不清楚。比如為何全民普及英文卻不語到facebook，又比如為何人們都在喊窮卻又買那麼多美國國債？」他以旁觀者的姿態觀察中國，卻從來不抱以情緒化，他懂得客觀審視自己中國情結中的愛恨交織：「喜憎只是個人情懷。」故而，他是那樣鍾情北京的人、知交、母校北大，卻敢於連發3篇文章批評北大，更敢於直述自己對中國的種種看法，他笑言：「是因為愛，因為善意。」

不斷被誤解是一種常態

「在中國，不斷被誤解是我生活的常態。」起初人們誤解他，甚麼荒唐的說法都有，猜測他是間諜、意圖分裂中國，或是純粹為了洩己私憤，可「其實我的初衷是作為中國問題的觀察者，我觀察，因為我感興趣。」他認為深入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開放狀況，對日本而言，有着決定性影響，所以更需要真正去了解，而這種了解過程中，最要把握好的，則是距離感。他說：「和中國打交道，距離太遠，會看不清楚，距離太近也不行。」接踵而來的會是各種質疑揣度。愈了解這個國度愈看不透，愈表達愈被誤解，但中國的意見市場仍是需要加藤的這種存在。官方從未為難過他，因他不挑戰根本體制，他選擇的發聲方式特立獨行，但並不激進硬化。按他的個人解釋是：「挑戰其實未到時候，中國的經濟整體上也是在向前發展，只有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，社會的認知變革才具有可能性。」

加藤從未受外界之音所困擾，他表示即使是在日本，自己被人質疑也是常態，但始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：「有良心的政府和媒體是支持我的。」

加藤自2010年起才在日本國內文壇正式發表文章，日本社會的論資排輩非常嚴格，話語權一定是控制在老年人手中，年輕人對時局有所看法，也要扮無知。加藤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顯然是個另類存在，他積極談論中國問題，亦會遭遇本國的父輩學者之質疑批判，但還是那句話，「是常態，但我並未收到攻擊」。因為日本人民一樣關注這個年輕人眼中的中國是怎樣？他描繪的中國屬實嗎？加藤提供了一種new value——對中日兩國都是。

從前，中國人所能辨識的外國人面目多是像大山那樣，藉助語言的力量穿透文化差異，但藉助寫作與評論，加藤卻開創了先河。一個日本人，用地道的中文寫中國，競爭對手全部是中國人，他自信又坦率地直言：「這個新的市場，過於被我掌控。」其實以華文寫作的知識分子與深度評論人，即使在台灣或香港，都唯有那少數幾個，對於外國人而言，更幾乎是一種不可能。但加藤認為，外國人如何了解與表達中國，應當引起中國社會的足夠重視。而為獲取這種重視，他也聰明地一早懂得：「真正能打動中國人的，能左右中國社會意見的寫作，一定是中文。」

加藤在寫的7個專欄中，3份內地、1份台灣、另外3份則是反哺日本。在日本，他既扮演着一個中國問題觀察者的角色，也是年輕一代的意見領袖。問及他，日本年輕人會羨慕你的影響力嗎？他的回答卻是能感到自己的累。他說：「我做事的原則是去做相對不同的事，哪怕並沒有任何影響力；那麼即使孤獨、寂寞、崩潰，都是值得的。」他熱衷於四方遊走、投入民生，亦同時在承擔着極高的行走成本。「上一次我離開北京是6月30日，之後去東京去上海去中山，再來香港書展。」也會對長期生活在北京感到厭煩，但那又能如何呢？「每次回到北京和伊豆（加藤的故鄉），都是回家的感覺。」多麼矛盾的內心糾纏，他鄉早已化為現實中的故鄉。

中國的邏輯

即使他不講出來，也不會有人懷疑他對北京、對北大的情感。他說：「北京是我童年嚮往的地方，也是讓我展開中文寫作之路的地方。」當年，他為掌握好中文，看人民日報聽電台廣播、隨時查字典，以這樣大的熱忱去投入異國，已不是一個普通年輕人能堅持的事，而05年在鳳凰衛視開始意見的表達之後，他更能分清用中文「表達」與「寫作」的不同之處。「寫作是尋找一種節奏。其實不管我未來做甚麼，中文寫作都既是我的愛好又是我的事業。」頓了頓，他加多一句：「中文表達是我將用一生去錘煉的任務。」

既然正是青春當年，多遊走海外自然有助於觀察之豐沛，加藤說自己還想去印度、美國等不同地方，但去那些地方，一定是為了更好地觀察中國。「我會把中國當作一輩子的事業。」如斯堅定，不禁令人好奇，他究竟有多了解中國？

因所抱持的客觀立場，令他勇於坦然表達已見：「中國的許多事情，不靠邏輯，而更順應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。」他在著作《中國的邏輯》一書中就敏銳地捕捉了一系列邏輯之外的當下社會關鍵詞：80後、90後、蝸居、愛國、大學教育問題等等，這些中國特色十足的語匯，以外國人的視角解讀，幾乎有些不可思議。而時下國人最熱衷於討論的安全感議題，在加藤看來，一言足以蔽之：「職業規範和底限不足時，哪會有安全感。」直面問題，不是刻意作對，而是深重的清醒承擔。

人的一生只能有一種「愛國」

對他而言，表述中國是因為自己愛它，但同時，他對中國的觀察一定是基於一位日本人對日本之愛的深厚動力之上。愛中國與「愛國」是相輔相成，亦只能是相輔相成。他說：「如果是談愛國，那麼人的一輩子，只能有一種『愛國』。日本需要我這樣的年輕人。」日本需要了解中國——大到如何令日本在對華經貿中受益，小到在中國市場推銷怎樣的產品，所以他將了解中國視為自己「愛國」的最適當表現。

加藤只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動去搭建他口中「日本海的橋樑」。他毫不懷疑自己所做事情會帶來的長遠價值：「10年後，人們會更理解我所從事的志業；現在都還是處於一個奔跑階段——中國和我都是。」

或許我們都該懷有一種感恩，去感謝這位從東洋而來的年輕人——他自信、自省、氣盛、刻苦，更懂得腳踏實地，他的文字與語言，都是他以外來者姿態對中國所奉獻的誠懇關照。華文創作市場的包容，理當鼓勵更多這樣的青年直言者出現，不問國界不問立場之褒貶，勤懇而執著的發聲本身，已是對中國之愛的一種無言呈現。

在見到李承鵬本人之前，便曾聽聞這類善意的提醒：「他的大眼睛會說話，可不要被他迷倒喔。」而其實李承鵬真正的魅力卻不僅限於此。如果你有機緣面對面聽他講上10分鐘的話，你一定無法不去驚訝，這位下筆理性、犀利、辛辣而近乎毫不留情的評論者，言辭談吐卻會散發出一種令人動容的感性。他稱自己是一個文人，而或許身為文人，終究難以磨滅骨子裡的那份悠遊與含蓄吧。

李承鵬身為資深足球記者、足球評論員，從15年前便開始遭遇封殺，卻反而愈挫愈勇，此後一路在球評界大膽直言，前後被封殺7次。日後，他開始轉為社會底層大眾發聲，評論的受眾面更廣了，就像他的「李可樂系列」——《李可樂尋人記》和《李可樂抗拆記》的主體都是小人物，講最平凡人遭遇到的最平凡困境，將最平淡階層的哀樂和他們所面對的暴力表述出來。作為一個寫作者，他在中國內地人氣爆棚，因為他寫的不是和尋常百姓有距離的純文學，而是生活，最反映時代步調的真實生活。

沒有批評精神不該當作家

「寫社會評論和你最熟悉的球評可有不同？」李承鵬眨了眨眼，如是回應道：「對我來講，就是把社會當成一場足球賽，因為我習慣於同時關注硬幣的正反面。」是社會賦予了他感同身受的經驗。他說：「04年開始寫房地產專欄對我而言毫不陌生，因為我當過房奴。」進而笑稱自己：「寫球評時罵罵協，寫社評時罵社會。」在他看來，好的文人必須有批評精神，如果只懂歌功頌德，那就不該當作家，該去當歌唱家。

身為內地大受歡迎、彰顯民聲的評論者，究竟發聲的空間有多大？李承鵬認為，空間其實都是靠自己爭取的，就以房奴為例，捍衛自身多少權益，取決於你如何對抗開發商，還要是做好持久戰的準備。他說自己如果現在突然不批評社會改為讚美，官方反而會嚇一跳。「以為要出甚麼大狀況，甚至覺得我是在反諷，變相攻擊。」每個人的社會分工不同，而他也相信這個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多管齊下。

盼有一日再寫不出黑色幽默

和大多數追求文學品質的作家一樣，李承鵬起初也寫美文，但很快發現：「生活不是這樣啊！」按他的話說，「如果一個人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，還能堅持不懈寫美文，簡直可以進進精神病院。」而他也並未覺得自己是最有勇氣的評論者，在他眼中，中國有很多人都做得很好，像是《我的父親是流氓》的作者于建嶸，又如韓寒。

香港書展之行帶給他的感受是重新理解這座城市所帶給人的安全感。「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城市，坐轎車上太平山吃飯，麻雀就停在人身旁，這是一個連鳥都感到安全的地方。」他認為，香港的大環境着實能反襯出內地作家生活狀況內的不自由。「像港人這樣罵特首是不可能的，自首還差不多。」他承認除去他這種以反諷搞怪為特點、每每直面現實問題便肺活量大增的寫作者之外，中國有許多作家的確很不容易。「像麥家、畢飛宇、蘇童，他們各有各的不易。」

但怨天尤人嗎？不，這絕不是李承鵬的風格，他直截了當指出，根本沒甚麼可抱怨的。「同樣是活在這種規律下這個土壤中，開的花結的果並不會一樣——敏感詞是不同的。」他認為作家置身於社會環境的大前提之下，所謂有才華，並不在於能堆砌多少華美的句子，而要看對生活能有多少思考。「也許有一天情況變好了，就不會如此，就像如果沒有沙俄時期的殘酷現實，便不會有果戈理、高爾基一干人等。李承鵬說：「我們都

是社會這個大棋盤中的棋子，我真盼有一日我不再能寫出黑色幽默。」若他真有得安逸那一天，定是社會已變得更好。

時代需要現實主義書寫

談到自己輝煌的「被封殺」歷史，李承鵬很是豁達。「其實官員是很難封殺作家的。尤其在內地人近年來的智商有了突飛猛進提高的情形之下。」他稱內地的變化之快令人刮目相看，3年一轉眼，就是完全不同一番新面貌。「過去明星用绯闻炒作，現在都換了方式，因為知道群眾更厲害，大家都變聰明了。」在這樣不斷變化的現實之下，寫甚麼、哪種角度切入，對他而言，根本不是刻意找出來的，而是從心裡打開一扇門，讓觀點得以被表述出來。

他的書寫立足於小人物的生存狀況，因他清醒看到：「大官僚的喜怒哀樂有大人物罩着，最底層的悲慘也容易被看見，唯獨小資、小知識分子非常可憐。」這一群體的喜怒哀樂、情感與付出，始終是面目模糊的。「但他們真的可憐。你想想，像紅十字會郭美美這種新聞曝光後，小男人和小女人們會看到，有些人用一輛車能直接換到一個女人，但他們自己的愛情卻那樣難。」作為中間層與中堅層，小人物根本沒有掙扎與對抗的餘地，唯有默默損失自己的幸福。而李承鵬知道自己正是他們中的一員，他甚至覺得自己付出的關心其實還不夠。「我會繼續寫滿這個人物走廊。」像是思緒了一瞬，繼而用交織了感性與感性的語調說道：「把希望寫在陽台上，讓他們照亮我們。」

下一步會寫甚麼？他冷靜講出一些聽來十足浪漫的構想：「可能會寫一個知識分子犯罪，或是寫一個愛上比自己大30歲的男人的女孩。」當然李可樂這個人物的生命會延續下去，《李可樂參選記》？（李承鵬今年5月在微博上表示將參選人大代表）《李可樂抗拆記》之後大概該有個《李可樂建城記》，對於內地的城市管理，作家顯然是不滿的。他說：「內地城市沒有那麼大的草坪，所以你就無法帶着拉普拉多無拘無束散步。」城市規劃是為着便於管理，而非為着居民體驗。那在李承鵬心目中，哪座城市好些？「聖彼得堡呀，有藝術、生活、戀愛甚至偷情，和中國完全不同。」你看，不由你不相信我對這位理性評論者的觀察吧，他其實是個着實感性的人。

但正是這樣感性又理性的文人，卻看到了現實被作為書寫題材的無限靈感。「在內地，我們整天會收到這樣的短信：你想知道另一半的手機通話記錄嗎？這說明人們早已習慣了一個監聽之城。不為生活，而為統治。」而生活，恰恰是他筆下最珍視最看重的部分。許多人視張愛玲為無上文學，新一代80後90後，則可能視安妮寶貝為文學的翻版，但李承鵬的態度卻極為Critical：「不是糾結才是文藝，張愛玲的文學和她的性格、生活經歷、閱歷、時代密不可分，山寨或複製她的文藝，不可能。」他認為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，是現實主義的書寫。復又調侃道：「總有寫作者，自以為是卡爾維諾或卡夫卡的傳人，但是否真有那種才華卻很難說。」他對內地文學現狀的諷刺可真的毫不留情——一些不小心成名的人，才華根本不夠，而真正有才華的人，以界外的身份去寫，又被指責為庸俗。（《我的父親是流氓》是李承鵬多次稱讚的書，按他的原話是：「其實文筆很高。」）

他認為真正的文學是要走向人間街道，「既靠身體寫作，又不靠身體寫作」，說到底是扎進現實中，再以清醒的筆，反觀映照現實吧。那麼身為一位資深評論人，李承鵬的評論並未，究竟對他而言卻可以被如何去界定與認知呢？他的眼睛並未給出答案，卻以言語作出了堅定回答：「評論，讓我們感知彼此的存在。」